

第一部分 早期结构主义

当我们对引发结构主义运动的诸因素作一番考察，就能够发现，存在于莫里斯·莫斯或乔治·冈奎汉姆的著作中的某些倾向已经开始动摇现象学和实证主义的前提。当有人专注于把社会看做一个系统——在那里，某些现象构成了一个“总体的社会现实”——或专注于考察知识的认识论基础（如冈奎汉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使研究的重点偏离了对社会或知识作本质主义的解释，而转向把这些对象看做是其结构的本质（也就是说，差异的本质或关系的本质）的结果。这样，科学的历史不再是心灵的表达；毋宁说，通过一种认识论的构型，历史结构了理解自身的知识框架。另外，当代的社会体验或个人体验（如弗洛伊德所阐明的）的变化也改变了过去的意义。过去再也不能就其自身来获得理解，因为现在，过去只能根据当代的问题获得解释。

1

加斯通·巴什拉

加斯通·巴什拉——认识论者、科学哲学家以及研究想象的理论家——对战后一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核心人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让·卡维勒斯，尤其是通过乔治·冈奎汉姆的著作和指导，米歇尔·富科在研究知识史时找到了自己的独特方向。还有，由于路易·阿尔都塞在巴什拉的“非连续性”概念中找到了灵感——他把它解释为“认识论的断裂”——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受到激励，开始重新思考有关时间、主体性和科学的理论。

加斯通·巴什拉 1884 年出生于法国乡下奥布河畔的巴尔市，1962 年在巴黎逝世。他先是在邮电部门供职了一段时间（1903—1913 年），1919—1930 年在奥布河畔巴尔市的地方中学任物理教师。35 岁的时候，巴什拉进一步接受深造——这一次他学的是哲学，1922 年取得了哲学的教师资格学衔。1928 年，他出版了前一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论接近的知识》和副论文《对物理学中一个问题的演进的研究：固体中的热传播》。1940

年，巴什拉凭着这两篇论文获得了索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主任的职位，并担任此职一直到 1954 年。

巴什拉的思想有三个核心的方面，这三个方面使得他成为一个独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使得他的著作对战后一代的结构主义者产生了关键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对认识论在科学中重要性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科学家对他们的实践认识不足，那他们的著作的应用就会根本地受到阻碍。认识论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科学努力的意义可以得到理解。正如巴什拉在《无的哲学》中说的：“从哲学上说，作为人们观察和研究对象的空间完全不同于人们眼睛所看到的空间。”这是因为人们所看到的空间总是一个被再现的空间，而不是真实的空间。只有通过求助于哲学，人们才能够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巴什拉进而又呼吁“对再现作系统的研究，因为它是决定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最自然的中介。”和现实与现实的再现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紧密的，乃是巴什拉坚定地对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或经验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强调。因而，对于广大的公众而言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作品《新科学精神》中，这位真正的认识论诗人证明说，根本说来，其实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形而上基础：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包括哲学和理论——是解释和论证的领域；而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则能够为理性主义提供解释材料。在把握新的事实方面仍简单地停留于天真和直觉层次——经验的层次——就会导致谴责科学认识而陷入知识的停滞状态；因为它根本无法意识到它所做的。类似地，如果人们夸大理性主义方面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声称科学最终不过是哲学基础体系的反映——那结果可能同样是不结果实的唯心主义。因此，在巴什拉看来，认识要想成为科学，就不能只赋予思想或现实以特别地位，而是必须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在接下来的令人难忘的表述中，巴什

拉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验必须让位于论证，而论证也必须求助于实验。”巴什拉的所有关于科学的本质的著作都受到这一原则的推动。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巴什拉在他的著作中对自己极力坚持的立场作了生动的说明。如同人们所料想的，诸如《应用理性主义》这类著作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不同实验类型的理论基础。因而，真正深刻的理性主义常常就是应用的理性主义，是向现实学习的理性主义。然而，情况并不只是如此。因为巴什拉也认为经验主义者同样能够从理论家那里获得对现实的某种认识，只要——如爱因斯坦——这时他能够认识到理论之于相关实验的优先性。在此，理论需要相关的实验作支持才能得到证明。通过强调认识论的重要性，巴什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了一起。在此，并最终在那个写作了科学“诗学”的人那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事实上都找到了各自的中介。

巴什拉著作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它尤其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他对科学史的理论化。巴什拉利用坚果壳对科学发展提出了一个非进化论的解释，在那里，科学先前的发展并不必然能够解释它在现在的状态。例如，在巴什拉看来，想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为是牛顿力学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巴什拉说，新的理论并不就是旧的理论的发展，“毋宁说，新的理论包含了旧的理论”。他还说：“知识的产生就像筑巢，一个存在于另一个里面。当我们从非牛顿力学进入到牛顿力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遭遇到矛盾，但我们确实体验到了矛盾。”在这一基础上，那联结后来的发现与先前的发现的概念并不是连续性，而是非连续性。因而，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之间，欧氏空间与海森堡和爱因斯坦提出的位置、时空理论之间，存在的是非连续性。巴什拉又一次指出，在过去，质量是根据与物质的量的关系来定义的。

因此，人们认为，物质的质量越大，需要作用于它的力也就越大，亦即速度是质量的一种功能。但由于爱因斯坦，我们现在知道，质量乃是速度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相反。在此，关键之处不在于我们发现先前的理论有所不足，因而必须推翻，而在于新的理论整个地是对先前的理论以及先前对现象的解释的超越——或者说两者之间是非连续的。正如巴什拉解释的：

毋庸置疑，有些知识似乎是永恒不变的。这使得有些人认为内容的稳定性是由于容器的稳定性，或者换句话说，理性的形式是永恒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新的理性思维方法。

但是，结构并不单一地只来自于积累；一定量的不变知识并不像人们时常认为的具有那么大的功能上的重要性。

事实上，巴什拉证明说，那真正能表现科学探索的本质的，乃是概念的意义的变化——通常是根本性的变化——或某一研究领域的性质的变化。因此，科学中的新学说常常是革命性的。

作为对巴什拉的科学发展概念的补充，指出下面一点是重要的，即所有的科学思想“本质上都是客观化的过程”——皮埃尔·布尔迪约（曾经是巴什拉的学生）就全盘接受了这一观点。进而，在说到现代科学思想的时候，巴什拉指出，它的方向基本上是联系地看现象，而不是孤立地看现象，或者说认为现象本身具有本质的属性。这一态度显然是当代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因而，巴什拉断言说：“在希尔伯特的体系中，对象的性质完全是关系性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

当巴什拉说“非理性被理性同化必定会引发理性领域相应的重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明确了他的研究的辩证本质——对此，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她的“语义学”与“符号学”概念已经给了我们提示，尽管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且具有不同的目标。思想总是“处于客观化的过程中”；它再也不是给定的和全面的

——也不是对自身封闭的和静态的，正如有些科学家已经指出的。

与这一思想观相联系的，是巴什拉的反笛卡儿哲学的立场。笛卡儿认为，思想要想前进，就必须从清楚明白的简单观念出发；巴什拉反驳说，根本就不存在清楚明白的简单观念，而只有复杂观念，这在运用观念的时候尤其明显。巴什拉指出，“应用就是复杂化”。而且，有时最好的理论似乎应是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现实的理论，可我们的作者反驳说，现实一点也不简单，在科学史中，想获得简单性的尝试（例如氢光谱的结构）结果注定达到的是过分的简单化——当现实的复杂性最终得到承认的时候。作为源于笛卡儿的一种观点，简单性不足以应付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现象都是一个关系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同样，现象只有通过综合形式才能被把握，这种综合形式就相当于巴什拉 1936 年所说的“超理性主义”。超理性主义是通过指涉物质世界而得以强化和获得新生的理性主义，正像超现实主义从另一方向通过梦复活现实主义一样。

巴什拉思想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方面，就体现在他的分析想象的形式，尤其是与物质、运动、力、梦相关的意象以及火、水、气、土这些相关意象的著作中。在诸如《土与意志的冥想》这类著作中，巴什拉分析了西方文化传统中诗歌与文学的大量指涉物，他运用这些指涉物去说明想象的作用。我们应当把想象的作用与外部世界的被理解作意象的知觉区分开来。正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想象的作用比知觉意象更为基础；因而问题就在于肯定“创造性想象根本的心灵特征”。在此，想象不是外部意象的简单反映，而是服从于个体意志的活动。巴什拉由此出发去探讨这一创造性意志的产品——这些产品不可能在现实知识的基础上被预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不能预见到想象的轨迹，

因为后者具有一种特殊的自律。服从于意志，意味着想象——正如某些超现实主义者们所认为的——必须处理半意识状态的白日梦，而不是无意识的做梦过程（如浓缩、置换等）。实际上，这一因素，再加上对原型的兴趣，使得巴什拉与容格而不是弗洛伊德更为接近。追忆容格也是巴什拉分析想象时尤其强调火、水、气、土四种“基本”元素的原因，他认为这四种元素在诗人的炼金术中是永远都存在的。某种神秘的方面由此而浮出水面（如容格的《心理学与炼金术》）。进而，巴什拉又强调了既定的主客关系的重要性——他是从现象学中获得这一观点的，尽管并不总是自觉的——这意味着，尽管想象能够生产意象（大多数的时候是原型的升华），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创造性的作品能生产出主客关系。实际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主体在此就是自我的主人；因为对于自律的假定近乎是绝对的。在此，一种封闭性的方面开始进入巴什拉有关想象的著作，而这是他的科学著作明显没有的。

因此，想象属于意象的领域，同样，这一点也必须与把外部世界理解作概念区分开来。想象产生意象，并且就是它的意象，而思想产生的是概念。若是没有为复活意象而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意象的世界就会凋谢，也就会封闭于自身。同样，若是没有某种超理性主义，思想及其概念也会凋谢——会死于它本身的完整性和简单性。或者说，巴什拉的立场可归纳为“开放性”和“复杂性”。在他的众多元素中——有许多是十分容格化的——概念倾向于男性化的事物，而意象倾向于女性化的事物。类似地，概念对应于白天的意象（因为它相当于“观看”），而意象对应于黑夜的意象。多米尼·雷考特在其论巴什拉的充满机智的小书中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位思想家著作的这一特征：“总而言之，必重申巴什拉的介于他的科学著作与论想象的著作之间的术语，那

就是有关白天和黑夜的意象。”在极大程度上，巴什拉本人对这两种元素能否事实上结合在一起，亦即科学中出现的意象以及意象领域中的科学是否能结合在一起，是持犹疑态度的。巴什拉的作品——不论本身究竟如何——已经被那些下定决心要打破概念与意象间藩篱的人看做是灵感的源泉，对于那些人而言，新的意象有可能成为新科学概念的基础，而新的概念也有可能在新意象的基础上出现。

尤为特别的是，巴什拉的作品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概念和意象都不是透明的，这一不透明性标志着主观性的元素总是在人类事务中游戏。这意味着在构成人类生活的科学框架和象征符号中，人类被言说与他们言说同样多。正如雷考特一再指出的：“若是没有认识到一种统一性——这应该到矛盾的背后去寻找——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歧义的文本”。是“统一性”还是“综合”？答案并非不重要。因为统一性意味着同质性，它有滑向简单的统一的危险。而综合——正如巴什拉所说的——关涉的乃是关系。后者可以在不同的元素之间存在（如果差异不是根本的），而且预示着某种区分。另一方面，统一性倾向于抹除关系。最后，巴什拉的工作总是倾向于把他在早期作品中提出的综合观点加以具体化。尽管这是必然的，可这种综合是他所看不到的，它是构成他写作出发点（实际地说）的必然盲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黑夜意象在这一异乎寻常的劳作中肯定要优越于白天意象。

Bachelard's major writings

Essai sur la connaissance approchée, Paris, Vrin, 1928.

Third edn, 1970 (principal thesis for the Doctorate in literature)

La Valeur inductive de la relativité, Paris, vrin, 1929

Le Pluralisme coherent de la chimie moderne, Paris, Vrin, 1932

L'Intuition de l'instant: étude sur la 'Siloë' de Gaston Roupnel, Paris, Stock, 1932

Les Intuitions atomistiques: essai de classification, Paris, Boivin, 1933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1934),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e la volonté: essai sur l'imagination des forces, Paris, Jose Corti, 1948

La Dialectique de la durée, Paris, Boivin, 1936. New edn, PUF, 1950

L'Expérience de l'espace dans la physiquis contemporaine, Paris, PUF, 1937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Contribution a une psychanalyse de 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 Paris, Vrin, 1938. Eighth edn, 1972

The Psychoanalysis of Fire (1938), trans. Alan C. M. Ros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Lautréamont (1940 and 1951), trans. Robert Duprée, Dallas, The Dallas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4

The Philosophy of No. A Philosophy of the New Scientific Mind (1940), trans. G. C. Waterston, New York, The Orion Press, 1968

Water and Dreams . 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atter (1942), trans. Edith Farrell, Dallas, The Dallas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3

Air and Dreams : 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ovement (1943), trans. Edith and Frederick Farrell, Dallas, The Dallas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8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u repos . Essai sur les images de l'intimité, Paris, Jose Corti, 1948. Sixth impression 1971

Rationalisme appliqué, Paris, PUF, 1949. Third edn 1966

Le Materialisme rationnel, Paris, PUF, 1953. Second edn 1963

The Poetics of Space (1957), trans. Maria Jolas, New York, Orion Press, 1964

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 Paris, PUF, 1960. Third edn 1965

The Flame of a Candle (1961), trans. Joni Caldwell, Dallas, The Dallas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e Publications, 1990

The Right to Dream (1970), trans. J. A. Underwood, Dallas, The Dallas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8

On Poetic Imagination and Reverie :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Gaston Bachelard, trans. Colette Gaudi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1

2

米哈伊尔·巴赫金

据有些人的评价，米哈伊尔·巴赫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他的著作所涉及的历史范围和他写作这些著作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高压）都使得巴赫金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社会哲学家。

巴赫金 1895 年 11 月出生，1918 年在彼得堡大学取得古典文献学的学位。主要出于政治的原因，巴赫金一生的大部分时候是在一种自我幽闭的状态中度过的。1936 年，他在偏僻的摩尔达瓦师范学院任教授，一直到 1961 年，只是 40 年代由于政治清洗的谣传而有过一次中断。尽管巴赫金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作为，但他在 1929 年还是因为被指控卷入了俄罗斯地下东正教会而被捕，并被判处 6 年流放，流放地是国内的库斯塔奈，在那里做图书管理员。到 60 年代，巴赫金成为苏联的偶像人物，他在 1929 年写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而他的最为知名的有关拉伯雷的论著——最开始是 40 年代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的——也于 1965 年第一次在苏联出版。随着人们重新对他的作品发生兴趣，巴赫金也于 70 年代初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如对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的研究——这些计划到 1975

年 3 月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完成。

巴赫金的学术经历和写作实践十分奇特。他不仅经常部分地修改已完成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继续阐述已经阐述过的概念——以至于他的学术轨迹主要是螺旋式的，而不是直线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许多怀疑是他写的但却以他朋友署名出版的著作的作者身份常常引起争议。这些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有署名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署名梅德维杰夫的《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把署名归属的问题搁置一旁，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巴赫金的著作生涯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早期关于伦理学和美学的论文；（2）有关小说史的著作与论文；（3）在他死后出版的续写第二阶段的题目的论文。尽管严谨的学术研究现在决心要证明巴赫金思想的深度，但实际上，在专家的圈子以外，巴赫金还是在西方知名度最大。这首先是因为他在研究拉伯雷时提出的狂欢理论，其次是因为他的对话或复调小说概念——来自于他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研究；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诸如“时空型”（*chronotope*）和“小说话语”这类术语——来自于他的有关小说理论的论文集。

在对拉伯雷的研究中——这是巴赫金的第一部译成英文的著作——巴赫金集中讨论了狂欢节在前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中期（拉伯雷 1494—1553 年）最重要的作品写于 16 世纪 30 年代初的状况。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仍然属于狂欢的传统，但也加上了自己的革新。那么，什么是狂欢？

狂欢最重要的方面是笑。然而，狂欢的笑并不等于它在现代意识中显现的特殊形式。它不是简单的诙谐、反讽或讽刺。狂欢的笑没有对象。它是正反同体的（*ambivalent*）。正反同体乃是狂欢结构的关键。狂欢的逻辑——正如克里斯蒂娃已经指出的——

不是真实或虚假，不是科学的量的因果逻辑和严密性，而是矛盾的质的逻辑，在那里，演员也是观众，破坏也就是创造，死亡就等于再生。

因此，狂欢既不是私人性的，也不特别地是对抗性的，因为它就存在于浪漫主义之前的时期和浪漫主义期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狂欢理解为官方正式批准的事件，或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节日庆典——或日常生活的常规劳作的一种中断；狂欢也不是为强化日常生活的主导体制及其权力等级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显著差异而设的一种节日。总之，狂欢不是官方（它通常都是严肃的）根据“面包加杂耍”的原则强化其自身权力的结果。相反，人民才是狂欢的主体，官方——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则总是寄生于它的仪式和法则之中——如教会和加冕。简洁地说，狂欢不只是否定；它没有功利主义的动机。它就是矛盾。

因此，狂欢不是可观看的奇观，而是每个人都参与其间的喧闹。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严格来说，是否存在一种狂欢理论。因为狂欢之外没有生活。处于狂欢之中的人既是演员，同时又是观众。并且由于狂欢的节日般的欢笑直接指向那些狂笑的人，所以狂欢中的人既是笑的主体，也是笑的客体。这种笑是一般性的，它具有哲学的基础，既拥抱死亡（例如恐怖的笑和怪异的笑）也拥抱生活。同样地，狂欢的笑是“有关世界的真理的本质形式”之一。然而，巴赫金指出，在现时代，笑已经被归结为一种“低级类型”。另一方面，狂欢本身是对低级的东西的拥抱。降格、贬低身体以及身体的所有功能——特别是便溺、性交——乃是正反同体的狂欢体验的组成部分。因此，身体就是这一双重性的组成部分。它不是封闭的和私人化的，而是向世界开放的。类似地，子宫与坟墓之间的近似性不会受到压抑，而是会——和再生一样——受到欢庆。在巴赫金看来，身体仅仅在文艺复兴

时期是“完成的”（也就是说，是私人的）。

狂欢中有各种角色，例如小丑，他们处于艺术与生活的交界线上，体验着诸如癫狂这样的行为，戴着“面具”扮演各种角色——在此，面具的目的不在于掩盖，而在于揭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正反同体的存在，显示了狂欢的拥抱一切的逻辑。对于面具，巴赫金写道，它是“与更替和再生的喜悦、与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与对整一性和相似性的快乐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当然，面具在 18 世纪就已经是一切虚假和不真实的东西的象征——尤其是在卢梭的作品中。事实上，面具常常就是伪善的伪装。由于狂欢的双重性，面具总明显是变形的。它覆盖着它的对象并使其变形，这已是众所周知。面具动摇了与自身同一的观念；它既揭示又游戏矛盾，并在这么做的时候开始压缩狂欢的实际存在的双重性。正如巴赫金说的：“面具与过渡、变形、打破自然界限、与讥笑、绰号相联系。它包含有生活中的游戏成分。”在克里斯蒂娃看来，面具象征着个体性的丧失和对匿名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同一性的设定。因而，面具总是同象征符号游戏，以便使它与固定的严厉形式相分离。面具是运动和变化的具体化。它不可能是严肃的，除非我们认识到拒绝赋予绝对权力以严肃性是一个严肃的事情。随着我们进入生活的游戏，结果，狂欢的话语被面俱化：就是说，成为双重性的、不恭的并具有笑的精神。

在正反同体这一双重性中，狂欢主要地把人民作为参与的舞台。由于人民的参与，狂欢成了再现的假象。因此，狂欢节使人民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分。人民作为参与者参与到狂欢之中，使普遍性得以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说普遍性是实践的和倾向于逃脱客观化的。还有，狂欢节的笑也给严肃留出了位置（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嘲笑它）——“旧约中没有一句话能得以幸免”，巴赫金说——可严肃却没有给笑留出位置。如果我们把严肃等同于

客观化（所有的严肃都是自我意识的），这就意味着笑不能被客观化，不能被理论化。

狂欢的逻辑（正反同体的逻辑）并不限于设定限制的二元对立双方的范围，而是连续统一体的权力的等价物（肯定的和否定的）。当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话语行为本质上都是二价的（既是此又是彼）以至于——例如——学院话语的严肃性就建立在压抑双重性的基础之上的时候，狂欢的逻辑就可以得到更清楚的揭示。

在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巴赫金指出，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小说有着一种“复调”结构，因为——和狂欢一样——它自身之内包含有他者的声音。例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文本中，“‘他者’的话语逐渐地、悄悄地渗透到了主人公的意识和言语之中”。

在巴赫金看来，不应把小说家的话语看做是语言学家研究的交流话语，而应把它看做是交流（对话）发生的“动态环境”。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巴赫金的概念就是超语言学：即意义的交汇而不是某一个固定点或某一个意义。例如，戏拟、反讽、讽刺就是巴赫金意义上的这个术语的典型例证（我们必须求助于超语言学/语义学的维度来解释它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过包括他者的言语于自身之内的对话方式给了我们同样的教益。这是一种复调的话语，在此，复调同样指的是没有固定的点，而只有声音的相互交织。复调是多声部的，而不是单声部的；它包括被对它的再现所排斥的东西。

巴赫金以狂欢的精神及其双重逻辑来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因此，我们不能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简约为众多人物的故事，认为它有着史诗般的典型的封闭结构。同样，如巴赫金所说，它基本上也不是“独白”的文本。按照最简单的理解，独白

的文本只有一个（单一的）同一的和相对统一的逻辑。它极其轻易地为自己挪用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方面就是那被传达的信息，而不是信息在言语环境中产生和被表述的方式。在巴赫金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通常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独白文本。相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不仅语言创造意义，而且语言之间的语境关系也创造意义（例如伊凡的“诗歌”、“大法官的传说”和斯麦尔佳科夫的忏悔）。

巴赫金的所有研究直接关注的是小说的构成方式——它的周围环境——而不是技巧、故事、特殊视点、意识形态或作者的情感。简单地说：作者占据了小说的场景的位置。复调小说使这一点比其他形式更为明确，但在几乎每一种小说类型中，都有多种语言可以运用，作者利用的只是其中一种。正如巴赫金解释的：

对于作者，不能在叙述者的语言中去寻找，也不能在故事所反对的常规文学语言中去寻找……毋宁说，作者此时利用的是一种语言，彼时又是另一种语言，为的是避免自己整个地受从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在其作品的每一处都运用这一口语的交流，这一语言的对话，为的是他自己能对语言保持中立态度，能在两个人的争执中保持超然。

尽管巴赫金形式上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保持距离，可他拒绝接纳作者意图中的意识形态作为解释艺术作品意义的方法，使得他距离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比表面上看起来近得多。在巴赫金看来，作者是一个空位，戏剧就是在那里上演——或者更确切地说，作者就是戏剧化本身。巴赫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一种动态的结构观，与在俄国形式主义者支持下出现的俄国结构主义相比，这种结构观肯定更具有动力论的特点。实际上，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品质的强调（甚至包括对他自己作品的——已经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未完成品质的